

◎美在生活

“生生之道”道“万千”

□程相占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日益推进，“生态”这个词语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热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言说也开始得到发掘与关注。

生态的基本意思是生态学，是英文术语 ecology 的翻译。究竟是哪位学者最早做出此翻译，今天已很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翻译非常出色，从某个侧面展现了中国传统的生态观念和生态意识，对于大众理解生态审美的深层内涵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生态的含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生态”是一个不算生僻的词语，基本义项有两个：一个是动词词组，“生”的意思是“生长”或“生出”，“态”的意思则是“样态”或“情态”，所以“生态”的意思就是“事物生长出样态或情态”；另外一个则是偏正词组，“生”为形容词，意思是“活生生的”或“生机勃勃的”，“生态”的意思就是“事物生机勃勃的样态或情态”。这两种意义上的“生态”之所以都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蕴，是因为它们传达出了一种自然生命观。这种自然生命观与今天的生态观念基本相通。

首先看第一种含义。明人顾璘曾经写过如下诗句：“层岩叠嶂通幽冥，草木生态俱含情。”（《顾璘诗文集》）诗歌描绘了在幽静的深山里，繁盛的草木无不生长出动人的情态。另一位明人杭淮则写道：“浮云生态自朝暮，碧草余葩满郊甸。”（《二溪集》）这是描写天上云朵从早到晚不停变幻的样态或情态，容易让人联想到“二八月看巧云”这样的俗语。

古代典籍中更常见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生态。首先想到了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麟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



山水册页之六 张大千

◎家风家训

胡则：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陈旭东

1959年8月，毛泽东视察浙江金华时曾对当时的永康县委书记说：“永康有个方岩，方岩有个胡公大帝。胡公大帝不是神，而是人。他姓胡名则，是北宋的一个清官，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所以香火长盛不衰。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也应该多做好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嘛！”

胡则出生于浙江永康胡库村，少时家贫，北宋太宗端拱二年登进士，开宋朝八陈科第之先河。胡则历任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先后出知浔州、睦州、温州、福州、杭州、陈州等。按察江淮、京西、广西、陕西等六路使节，并曾担任权三司使使部流内铨、工部侍郎、兵部侍郎等朝廷重臣。“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苏东坡笔下的西湖美景令人流连忘返。早在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州前几十年，公元1026年的杭州知州胡则面对钱塘江大潮引发的严重水患，集聚民力修筑钱塘江海

几时。”（《晚发公安数月息此县》）这是一首感时伤怀诗，慨叹那种活生生的美景情态不能长久。这种意义上的生态较多地用于艺术评论，特别是用于评价绘画的特色和艺术成就。例如，宋人刘道醇在《五代名画补遗》中，认为有画家钟隐的花竹禽鸟画达到了神品，最爱画的白头翁、斑鸠等“皆有生态”。宋代佚名的《宣和画谱》记载郭元方善画草虫，“信手寓兴，俱有生态，尽得蠖飞鸣跃之状。”清人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记载画家姚月华所画芙蓉匹鸟，“约略淡淡，生态逼真。”这些言论都是在说，画家能够将所画事物生机勃勃的情态、神态，用卓越的艺术技巧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以“良知”观生态

其实，“生态”的上述含义可以合在一起，将之理解为“事物生长出来的生机勃勃的样态或情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事物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样态或情态”并非现成的、凝固的、具体的东西，而是由人的“灵明”来感应和呈现。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对此体会最深。

王阳明游南镇时，一友指着岩中花树向他提问：“先生您曾经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这个命题，但是，咱们眼前这棵树上盛开的花朵，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咱们的心有何关系？怎么能够说这朵花不在我们心外呢？”这个疑问是阳明心学的最大难题。王阳明这样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文成公全书》）这个回答其实区分了花的两种状态，一种是处于“良知”感应之外的花，它近似物质意义上的植物，这种意义上的花当然是客观存在于人心之外的。但是，王阳明关注的是花的“颜色”，这个“颜色”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或红或白，而是“容颜色泽”的意思——花的容颜色泽，只有经过人心之良知感应，才能呈现出动人的光彩。这种意义上的“颜色”，真正的含义正是“生机勃勃的样态或情态”。

从王阳明这个典型例证可以说，没有人的“良知”，就不会发现万物的



桂林山水 罗尔纯

“生态”。包括王阳明在内的中国古代圣贤一贯强调“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孟子·梁惠王》）这既是他们对于万物呈现各自“生态”的前提条件的体认，也是对于人的使命的倡导。宋徽宗尽管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其绘画“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广川画跋》）“万物各得全其生理”这个命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一个角度是万物：天地万物都应该全面地展现与生俱来的生命之理，其“生理”来自道的大化流行；另外一个角度是人，人的使命就是“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帮助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全其生理。

万物皆有生命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美学名著《判断力批判》中曾经提到“生命感”，主要指人在进行审美判断后的愉悦感以及人类两种先验能力（即想象力与理解力）之间的自由游戏所带来的自由感。遗憾的是，康德受时代局限，将自然视为完全由因果律控制的机器，自然事物基本都没有生命和灵性的物质，因此，他的“生命感”与人类之外的自然事物无关。

中国传统的生态言说表明：中国古人认为不但人有生命，自然事物包括花鸟虫鱼同样也有生命，其生命的样态和情态也展现着生命的神奇和魅力。所以，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引发人们审美感情的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而是审美意义上的“物色”或“物性”。前者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所写，是自然事物那种富有生命感的形态；后者则是郭象哲学所表达的天地万物各自具有的“自性”，也就是事物自身具有的天然本性。

明代袁宏道在解释“趣”的时候，曾经举例“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叙陈正甫会心集》）。这里的“色”是“山光水色”的“色”，这里的“态”是“意态由来画不成”（王安石《明妃曲》）的“态”，二者互文，可以互换。山水其实也有其“意态”，感召着人们的诗情画意，所以古人才认为：青山不墨千秋

画，绿水无弦万古琴。这样审美意义上的青山绿水，绝不是自然资源意义上的山水：山意味着矿藏或木材，水意味着电力或淡水资源。清除自然山水的“意态”和“情态”，将之视为物质性的、可开发利用的、可进行市场交换的“自然资源”——这就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观念，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这也从反面说明，中国传统生态言说具有深厚的生态意蕴，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诠释。

生生之道

中国传统生态言说背后隐含着“生生本体论”。《易传》明确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种哲学观念认为，宇宙中有一种神奇力量，一直不停地化生、孕育着天地万物，中国古人将这种力量称为“道”。就生生特性来说，这种道也就是“生生之道”。从最终本源来讲，包括花鸟虫鱼在内的天地万物都是生生之道的产物。中国艺术家即使在描绘最细微的事物比如草虫的时候，也总是试图呈现其“生机”或“化机”，也就是生生之道化生万物的那种神妙的机制或机理。生生之道化生万物的基质（或材质）被古人称为“气”。“气韵生动”由此成为中国艺术美学的最高追求。而这些美学术语或命题，都与“生态”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

在生态学诞生之前，人们只是朴素地认识到有机体与环境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生态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科学范式，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是地球生态圈（即生物圈）中的成员之一，理应与生态圈中的其他成员发展一种共存、共生、互惠、互益的关系，共同构建生态命运共同体。要做到这一点，人类必须首先改变自己对待自然事物的观念和态度。中国传统的生态言说告诉人们，自然事物可以“生长出勃勃的样态、情态、神态和意志”。种意义上的“生态”，正是自然万物各种生命样态与生命价值的具体体现，人类理应对之尊重和欣赏。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七夕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起源于古代的星纪崇拜，进而升华为牛郎织女相会的爱情故事。七夕之夜成为少女祭祀星神、祈求心灵手巧的浪漫之夜。

七夕习俗的丰富与圆满是在六朝时期。六朝时期关于七夕有多种生动地记述，晋人周处《风土记》描述了民间七夕习俗的生动场景：七月七日，其夜将庭院洒扫干净，摆上茶几饭桌，设酒脯时果，说河鼓、织女二星此夕相会。守夜的人都心怀私愿，向上天表达你的求富、求贵、求寿或者求子的愿望。汉魏以后，七夕主要成为表达女性愿望、比试与展示女性巧艺的节日。

七夕有爱更“乞巧”

□萧放



象征“乞巧”文化的手工：穿针引线

七夕乞巧习俗丰富多样，除了仰观星汉，乞求富贵子嗣、容颜美好外，心灵手巧是传统社会对女性的特别要求。甘肃陇南西和以撒花瓣的方式乞巧，乞巧歌谣，“巧娘娘，快给我姐妹赐花瓣，莫赐宝贝莫赐钱，赐我一副巧心眼”。巧心眼属于心智之巧，巧妇是民间社会推崇的偶像。古代“妇功”同样重要，它强调女性纺织、针线等技艺的掌握。因此，七夕乞巧在后代特别重视女性手巧的精巧。近代山东有拜巧姐乞巧，唱乞巧歌：“我请巧姐吃桃子，巧姐教我缝袍子。我请巧姐吃李子，巧姐教我学纺织。我请巧姐吃甜瓜，巧姐教我绣绣花。”穿针乞巧是自汉代以来的七夕乞巧项目，月夜穿针要求快、准、巧，这是难度很高的技术活。在民间还有一个特别的园艺乞巧方式，那就是种巧芽。人们在七夕之前，培植豆芽或麦芽，到七夕活动期间，妇女带着各自精心培植的作品，奉献给巧娘娘，同时让各家品评，看谁的巧芽长得茁壮顺滑，谁就巧。这是种植技艺的比试，是对女性智慧的激发与农事技艺成果的肯定。

当代社会在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人们对七夕节重新发生兴趣。七夕节再次得到社会重视。七夕节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节日重振的典型之一，它直接应对的是西方的情人节。中国本来没有情人的概念，中国重视的是家族社会关系，节日服务于这种家族文化需要。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节庆文化进入中国，情人节受到年轻人青睐。由于西方节日的启发，或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人们发现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中有两情相悦的节日元素，于是对七夕进行改造，有意识地遗忘乞巧习俗，扩张男女相会的习俗传说，提出七夕为中国情人节或爱情节的说法。但是，这些以两性交往为七夕主题的节日改造对于纯正的传统七夕节来说是有偏差的。因为传统七夕以乞巧为主，所有活动围绕女性之“巧”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祈愿展开。

七夕作为传统的女性节日，在当代社会要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既传承历史文化传统，也要变革创新。

其一，复兴传统乞巧内涵、重视手工实践。乞巧是传统七夕的重要内容，七夕乞巧活动主要强调人们的心灵手巧。当代社会虽然在乞巧形式上不一定追求古制，但可效法古意，利用七夕节日调动人们对手工技艺的兴趣，以巧艺展示与巧技竞赛的方式激发青少年的创造欲望与创造动力，磨炼心智，在技巧的比试过程中锻炼思维能力与动手能力。将七夕节作为传承技艺传统、倡导重视技艺实践的民俗节日，结合中小学教学中的手工课与课外兴趣教学活动开展七夕乞巧的展示与竞赛，如手工小制作、美术作品、小的技术发明、电脑动画、程序设计等。

其二，传扬牛郎织女传说，强调爱情忠贞。将七夕作为两性交往的时机与两性伦理、情感教育的特别时间。七夕节因为有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被认为是中国的爱情节，两情相悦与相互守望是七夕的主题之一。七夕节俗中强调男女的彼此欣赏，为青年男女的正常交往提供时机与空间。同时七夕也强调人们对感情的忠贞，这种忠贞经受着时间流逝与空间分隔的考验。在快节奏的今天，人们的情感生活面临着比传统社会更大的挑战，一方面两性交往合作的机会增多，所面临的情感困扰也随之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学习与工作的原因，情侣常常分隔两地。在这样的社会境遇面前，七夕所承载的牛郎织女矢志不渝的爱情传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依托七夕节作适当的两性伦理与两性情感的社会教育，同时倡导男女情感忠贞、家庭和美的社会风气。

七夕节在早期是庭院式乞巧节日，唐宋时期，演变为社会节日，明清时期七夕节回归庭院。到了当代，七夕节由家庭节日重新扩张为社会节日，人们可以在七夕节的仪式展演与人际交往，加强地方社会的联系，活跃与丰富地方民众生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子课题“社会转型期文化习俗及生活方式的嬗变与重构”成果之一）



胡则塑像（网络图片）

训》崇高的家国情怀和深厚的为民情怀，崇尚学习，注重教育，一心为民。北宋以来，胡库村先后建有上书院、“词塾”、文昌阁、崇本书院等学所，不仅为族人读书专属之地，也为方圆周边村落学子延师授业。

如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精神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两学一做”、干净干事、清白为官的生动样本。

（作者为中共浙江省金华市委党校副教授）